

# 呵护善的初心与美的体悟

读长篇小说

和精神图景的审美扫描与精神批判。作品的主人公淳于宝册是一个有惊人财富的当代中国企业家。小说的高妙之处在于,张炜从头到尾都没有像众多商战小说一样具体叙述主人公是如何一步步取得成功的,而是从主人公的情感史出发来叙述和建构人物独特的情感世界,以此窥见生命深处的魂魄和时代精神图景。张炜舍弃了自己所擅长的家族叙述模式,从淳于宝册的情感史着手。小说以美人蛹儿对自己美丽胴体的自我审视开篇,再逐渐转入蛹儿视域下的淳于宝册的主体性叙述,即以蛹儿作为叙述线索,在蛹儿与主人公进行生命对话中,讲述淳于宝册苦难的童年史和不断逃亡的成年史,让读者与蛹儿一起去理解、体悟、同情、悲悯、怜惜这位经无数苦难折磨的“成功人士”。这位“艾约堡”的主人、巨大财富的拥有者,虽年过五旬,又有着海豹般的力、速度和激情,但是,他的“荒凉病”发作或寂寞孤单时,是致命的、危险的,也是悲伤的、无助的。

艾约堡秘史 张丽军

淳于宝册形象的复杂、独特,不仅在于其性格、心理与情感的驳杂与对立,更在于其精神世界与其建立的物质财富王国的内在悖论性。尽管《艾约堡秘史》对“人”进行了精微的描写,而对淳于宝册的“物质王国”的叙述又颇为简略,但是,我们依然从小说的叙述缝隙中,窥见“艾约堡”王国的“秘史”:凭借智慧和胆识,在妻子“老政委”的指导下决策下,淳于宝册逐渐建立起一个拥有矿业、钢铁、远洋、运输、建筑、医药、金融等众多领域业务的巨无霸式的狸金集团。而与之跟“老政委”有着生死之交关系的上级领导的特殊关照密不可分。这恰恰是淳于宝册与“艾约堡”的内在精神毒瘤。善良的、孤苦伶仃的淳于宝册在妈妈、奶奶和老师李音等人的关爱下,从轩子等大恶人和劳改营那里逃脱出来,从未向坏人与恶逆过“哎哟”(投降),但是,在积聚财富的过程中,淳于宝册不知不觉就进了“哎哟”,可谓是劣迹斑斑。尽管这些恶,是淳于宝册本人坚决反对的,但恰恰是他所领导的狸金集团攫取财富所带来的。“艾约堡”不仅是隐秘的财富之堡,是淳于宝册有着疼痛记忆的苦难之堡,而且是铭记历史剧变与时代忧伤的精神批判之堡。

《艾约堡秘史》叙述技法成熟,结构紧密精致,融深刻而重大的时代问题与人物思考于人性书写。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注重对淳于宝册内心的审美书写:善与恶、情与欲、财富追逐与爱情苛求,在他的心灵之中悖论性地共存。小说的中心事件是淳于宝册财富追逐和爱情追求的交集。正如他所述,爱情、欲望、财富,人世间的一切奇迹伟力都交集在,是正相关的。淳于宝册在兼并海边滩角村时,爱上了来这里搜集拉网号子、具有非凡气质的民俗学家欧晓兰。爱情的良机与财富的商机似乎“携手而来”。但是,这一次,淳于宝册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滩角村自然历史风貌,拒绝交换、购买和改造,而且得到了欧晓兰的理解、支持与爱慕。自然,淳于宝册的爱情追求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滑铁卢。在一次深谈中,欧晓兰告诉淳于宝册,狸金集团是她和吴沙原以及当地百姓的“敌人”,他们不会成为“伙伴”,更不会成为恋人。

事实上,尽管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沉着、坚毅、神秘、率真”的淳于宝册念念不忘恩师李音的教诲,对爱与美抱有热情。在“老政委”走后的财富战役和爱情追逐中,淳于宝册再次陷入迷茫,逐逐如年少时那个迷途的孩子。“我做错了什么?改正还来得及吗?我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走到今天,再往哪里走啊?”前途道路在哪里?狸金集团的“前途在哪里?一个从未迷过“哎哟”的人,何日向恶人递了“哎哟”?《艾约堡秘史》不仅写出了一个中国当代企业家的苦难成长史、心灵情感史,更写出了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作品在提示人们,要记住生命的来路,不可忘了生命的苦难,更应该呵护善的初心与美的体悟,以善与美之心去面对天地、面对人生。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如何关怀时代、书写当下现实,不仅是对当代作家最大的考验,而且也是时代对当代作家审美创作的迫切召唤。然而,难就难在,文学创作需要建立在深切而独特的情感记忆与生命体验之上,所以作家一写到童年、故乡,就会无比生动精彩,而面对当下生活,尽管身处其中,却因为芜杂、纷繁,而感到难以驾驭、难于分辨,陡生“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困惑与苦恼。因此,对当下生活进行艺术上及时的展现与思考是一道“必答题”,又是一道“难题”。张炜的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恰好回应了当下时代最迫切的精神需求,描绘出具有“当下现实主义”的时代精神图景,是一部具有深度叙事审美品格而又好看耐读的当代文学力作。

张炜是一位具有思想家精神气质的作家。从《古船》开始,到《九月寓言》《柏慧》《刺猬歌》,再到《你在高原》,他的文学创作都显现出齐鲁文化宏大的精神气魄与儒道互补的伦理文化追求,对百年以来中国历史文化进行深刻的精神追索,塑造了一系列有性格、有魂魄的典型人物形象。《独药师》则开辟蹊径,深入千年来山东半岛的长生文化和近百年来革命历史文化,展现历史剧变中季家兄弟对革命、长生、爱情的不同思考,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

《艾约堡秘史》是张炜最新的一次艺术变法。它不仅不同于《古船》的现代家族史书写,也不同于《独药师》那种对古老文化传统在近代历史裂变的叙述,而是一次全新的思想出击,是对当下社会剧变

联系邮箱:gmbwx@163.com

文艺观潮

# 新时代文艺水准的一道“屏障”

## ——谈文艺类图书编辑的责任与使命

林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繁荣文艺创作,发展新闻出版,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全国政协委员、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在谈及文艺类图书编辑的职责时表示,尽管读者是支撑整个行业的重要力量,但编辑并不是盲目的追随者,实际上起着引导者的作用。作家、学者、译者在文艺类图书出版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在传统说法中,将编辑的工作称为“剪刀加糨糊”,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这些说法过于消极,不太恰当。他认为编辑是一个奉献的职业,作家、编辑、读者之间是同行共进的关系,编辑应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热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作品的生产中来。我觉得,在当前环境下,重新认识、梳理文艺类图书编辑的责任与使命显得十分必要。这是因为随着科技化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多介质阅读被普遍接受,全媒体开发运用成为热门,而“去编辑化”的说法盛行一时。

在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的发表空间可谓无处不在,网站、论坛、社交媒体数不胜数,作者可以在这里由自己随时直接发布、发表文章。有时作者自己发布的作品轻而易举就形成了阅读热点。与此同时,作者的自我成长的空间不断拓展,能力不断增强,在创作过程中就将自己的作品呈现给读者,与读者产生互动,而后不断修正、丰富自己的作品,自身水平也得到提升。也就是说,“编辑”的地位与价值似乎有被消解的倾向。

资本介入文化生产后,内容的运营形式更加丰富多元。“内容”一词越来越少被人使用,“IP”(知识产权)的提法四处可

见。在文化生产中,资本的力量根据工作分工直接把运营内容称为“产品经理”。这一命名正如资本在市场上的强劲威力一般,最大程度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却忽略了其最可贵的精神属性,弱化了编辑的角色功能,也放弃了原本必须坚守的使命担当。

在当下的文艺类图书出版产业中,合作出版占有一定的份额,一些编辑简单化地把作者与自己的关系定位为“甲方乙方”,基本听从作者的意愿进行来料加工。与此同时,作者现有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和查证能力,已经能够基本消除行文中知识性差错,编辑不再需要一些低级的错误而去查证与核实。久而久之,编辑的功能不断地被磨灭、削弱了。

其实,只要认清出版“选择、发现、传播”这个本质功能不变,那么就能更坚信编辑环节依然存在、编辑的角色依然重要。无

论是纸质出版还是新媒体传播,都是以内容来占领市场、获得效益的。内容是靠编辑发现与选择后呈现出来的,编辑是内容创新的关键。

编辑工作是需要专业基础和职业技能的。专业基础决定了编辑从事工作的具体方向。譬如从事社科文化类内容编辑工作的多是文史哲专业出身,科技出版更必须由专业对口的编辑去承担。编辑的职业技能更多体现在执行国家规范与追求精良制作之中,反映了难能可贵的工匠精神。新时代呼唤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出版物,这是对出版业有文化创新的使命,才能与时代主流同频共振。当文艺类图书编辑把追求时代精神的意义融合到自己所从事的出版工作中,自身的真正价值才能得以凸显。海峡文艺出版社反映老兵还乡的长篇小说《原乡》和反映民族融合的长篇小说《魏孝文帝》就体现了文艺类图书编辑对重大时代命题的思考。小说《原乡》再现老兵辛酸往事,以家国的深情燃起一把火,融化历史的冰块。小说以老兵的魂魄进了自家的祠堂,来喻示台湾这个中华民族的海外游子终会归入中华大家庭,祖国统一大业终将实现。在历史上,魏孝文帝推动了伟大的民族大融合,“以文化之”,使一些少数民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实质是重新缔造了一个大中华民族。长篇小说《魏孝文帝》就形象展示了魏孝文帝的伟大抱负,通过摹写充满曲折的

政治改革之路,表现出波澜壮阔的民族融合之潮,全面地彰显了民族融合的历史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编辑追求的思想高度体现了时代文化的水准,因此编辑的使命非同一般,依然是新时代文艺水准的一道“屏障”。

对内容的选择是文艺类图书编辑的一项根本性工作,而保持与作家的密切联系则是不可少的基本功。

编辑最好的角色就是能与作者产生价值共鸣。由中华文化的精神观念、气度神韵、智慧品格等塑造而成的文化自信是编辑的底气。历史的积淀,伟大的实践为作家提供了值得大书特书的创作题材。如果编辑不能与作者同步地准确把握社会脉动、积极探索创作潮流,是无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最终也无法为社会和读者奉献出优秀的精神产品。作家与文艺类图书编辑之间的理想关系,形象地说应该是一座高山对另一座高山的仰望。作家创作表达的是自己对世人心的深刻洞察与严肃思考。编辑在作家与作品面前,保持谦逊是必要的,但更要秉持一种不亢不卑的态度。这个态度的底气源于相信时间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源于仰望文化而产生的宝贵自尊。

当下文艺类图书编辑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与棘手的难题,但从事一项事业需要精神力量作为底色、作为支撑。唯有坚守出版的本质,坚守对文化的敬畏、坚守使命与担当、坚守自己的主体精神,方能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上去推动文化创新与文化复兴。

(作者系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副总编辑)

# 真性情的自在抒发

## ——读文学评论集《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

汪亚琴

《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是刘川鄂新世纪文学批评工作的回顾和总结,更是一本极具“刘氏”批评风格的评论集。

刘川鄂大学期间苦读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对他影响很大。“宁可清醒的悲观也决不盲目的乐观”的鲁迅式思维,形成了刘川鄂“冷眼看中国文学”的方式。基于对“美是自由”的透彻认识,他在文学批评工作中始终坚持审美立场和人性信仰。刘川鄂曾说,读过较多中外文学经典,见过威深沉的高山大海,很容易看出中国当代作家的“浅”和“矮”。见识过“高山大海”的人,就能生发出“一览众山小”的气魄。痴迷于“高山大海”的人,才能形成“眼里有大师,心中有经典”的文学观,才能培养出敏锐的审美直觉。刘川鄂是将整个生命带入学问的。他的文学批评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是真性情的自在抒发,是注入生命活力的“心灵学术”。他不会生搬硬套各种理论来支撑言说,亦不会醉心于作品解读,更不会顾左右而言他。他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爱”和对池莉的“贬”,实事求是地从文学本身入手,明确地做出审美价值判

断。他将个人的活力与性格注入文学批评,在“批”与“评”的适度结合之间,完成了“批评家左右手”的使命。

评论集《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冷思考”,主要是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坛现状、文学文化热点以及湖北文学现状的反思。涉及“中国经验”、民间与底层文学、作家明星化与作家群体体制化、区域文学特别是湖北文学等,还具体分析了对张爱玲、余光中、韩少功、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第二部分为“池莉论”,这部分既是对刘川鄂在世纪之交批评实践的一个回顾与延续,也是对当年“刘池论争”现场的还原与回应。第三部分是“批评之批评”,主要是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包括分析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探讨文学批评的策略、文体,直陈批评家在当下文学环境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并呼唤批评家要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

何谓“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刘川鄂在《“池莉热”反思》一文中明确提出,批评家的左手承担“指出作家的描写特点包括缺点”的职责,右手发挥“指导和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的作用。这也就是他在《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新策略》一文中

提到的“求美”和“求疵”的批评取向。面对“经典”缺失的中国文学,创作水平偏低、创作后劲不足的当下文学现状,《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形成的“锐批评”风格,也是刘川鄂在审美与人性标准引导下,审视新世纪文坛的自然选择。

刘川鄂最突出的批评特色是“泼冷水”。对大家趋之若鹜的热点,他一般都抱持警惕心态,大多时候都是“解构”,而不是“唱赞歌”或“保持沉默”。如在此书开篇《关于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当代作家因为太局限于“中国经验”而不具有世界视野,应该提倡的不是“小脚与辫子”的旧“中国经验”,而是“五四”积累的“警惕传统,拥抱现代”的新“中国经验”。刘川鄂也对“民间文学”“旧体诗词热”等热点话题采取了“冷观”的方式。他习惯于从“热点”中抽离出来,一语中的地指出“热点”背后存在的问题。对于看惯了“吹捧”式批评的读者来说,刘川鄂的“泼冷水”批评无疑更具活力。

针对具体作家的批评,刘川鄂更是能抛开人情面子的束缚,不惧作家“威名”,直言发声,坚定地审美价值判断,

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对湖北作家池莉的批评。他直言池莉是一个“既无‘传统’之根又无‘现代’之境只会感知‘当下’的作家”,而她的作品“不能丰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并且“也不能唤起人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刘川鄂不仅能抛开人情面子批评同省作家,甚至在贾平凹研讨会上,当面批评贾平凹的传统文人气和神秘主义表达。这样的胆识和勇气,是他热切“呼唤有胆有识有良知的批评家”的亲身实践。

立足于“人性与审美”标准,刘川鄂的批评语言灵动鲜活、简洁有力。他特别善于用生动而简短的词语总结特征、表达观点、言辞犀利、一针见血。在这本评论集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外在力量对刘川鄂文字的干扰,呈现的是一个文辞洒脱、思维开放、落笔有力、有真性情的批评家形象。

以“人性和审美含量”为标尺,采取“冷批评”策略,写出具有“时代感”的批评文字,这是《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彰显出的特色。梦想、懂得、直言、参与,构成了刘川鄂文学批评工作的关键词。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文章,如同书法,最讲究的是节奏、韵味。上段与下段,上句与下句,那个长短高低,不是乱安排的。当代书法家都很自信,但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以金钱来衡量水平的。看很多书画家作品上的题跋或落款,都让人气愤。何绍基说:“作文必须有执拗,气味始能深厚。然亦须读书,看书时须从性情上体会,从古今事理上打量。与书理有贯通处,则气味在胸,握笔时方能流露。”这话说得真是好,需要悉心体会。何绍基能有那么高的书法成就,也是自然而然的。

有些艺术家已经不会用“汉语”说话了。他们的“汉语”成了没有根的语言,更多时候甚至不过是胡言乱语。在中国,一个连汉语都不过关的艺术家,不管你从事的是哪门艺术,肯定是有问题的。有时候,我开玩笑说,看一个画家的题跋,就可以知道他的绘画水平。

陈传席把“才能”“才华”区别开来,他认为:“画人的才能偏于技,习练而可得。才华偏于艺,非仅技也,读书、思考、历练、胸古识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人的情操、胸怀、志趣、境界经过各种知识的滋润、锻炼,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所谓修养、修之养之,共除庸俗,进入高雅,境界则不同一般,‘能’方可升为‘华’。”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

当年,唐寅拜周臣为师,最后唐寅的画,就艺术性而言超过了周臣。有人问周臣何故?周臣坦言“但少唐生三千卷书”。可见,读书,读好书,读经典书,对一位艺术家的重要性。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但少唐 文艺家要涵养

杨光祖